

Culture and Anarchy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政治与社会批评

[英] 马修·阿诺德 著 韩敏中 译

Matthew Arnold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 / (英) 阿诺德著；
韩敏中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

ISBN 7-108-01595-1

. 文 阿 ... 韩 文化 - 现象
- 批评 - 英国 - 现代 社会生活 - 批评 - 英国 - 现代
. K5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53931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张 红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2年1月北京第1版

200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8.625

字 数 170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15.00元



马修·阿诺德

译 本 序

中国读者可能听说过大名鼎鼎的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1822 - 1888），也听说过其代表作、在英语世界广为人知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但是有兴趣翻开这部译著的读者可能会感到迷惑。首先，作品的副标题为《社会和政治批评》，可是它不像当今的社会科学著作那样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没有对“理论体系”的界定和阐述，甚至一再声明自己不讲体系；与此相关的是，行文的语言风格和现在我们通常读到的社会学、政治学或史学的著作也很不一样，几乎从头到底用一种讥嘲、挖苦的口吻，时而也带着自嘲，况且将“文化”、“意识”等当作人那样对待的修辞手段（如“文化说”、“文化要求我们”、“我们深入意识，意识就会告诉我们”等等），也不大合乎现在人们对政治批评的期待。另一个可能的阅读障碍是，这部著作似乎沉浸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具体问题的争执之中，它大量地应答报刊杂志的报道和评论，其中将近一半的篇幅同当时的宗教纷争有关；这些具体问题似乎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更不用说当时的许多具体争端和具体看法早就过时（就像任何涉及时下热门话题的内容、见解都会过时一样）。对此，阿诺德

自己早就有言在先。关于他所经常引用的18世纪英国神学家威尔逊主教的语录，他说，“我们应该像朱伯特所建议的、读尼科尔的方法那样来读这些格言，即学以致用。由于时世变迁及因此必然引起的观念变化，其中有些内容已不再适用，读者可以将这些搁置一边。”

阿诺德去世时，已被公认为维多利亚英国的文化主将；《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成为传世之作，是因为阿诺德在介入具体论争时所表现的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因为他在英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无法绕过去的重大问题，也因为他发明的不少标语式词语早已进入核心英语，成为英语世界受教育者的常识性认识。例如，在英语中，阿诺德对英国中产阶级多少带有贬义的指称“非利士人”，大约就像中文中鲁迅笔下的“阿Q”或“阿Q精神”一样，已成为一个丰富的语义场。

有意思的是，从阿诺德写作的时代至今，一百多年来，他的巨大影响往往以同他的争论体现出来，例如，《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就对后来有关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辩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说到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我们中国人当然不会感到陌生。我们的许多政治运动，包括现在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一部京剧《海瑞罢官》开始的；大到文学巨著《红楼梦》、小到普通电影《武训传》或《苦斗》，都可引发政治运动或成为运动的焦点；整个20世纪，我们感受政治风云、路线斗争、风云突变的神经已修炼得无比发达。但是，阿诺德所说的“文化”及其同政治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上述情况。“文化”应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

类一切最优秀的思想、文化之积淀，这种宽阔的、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应成为变革时代凝聚人心的力量；它在承认变革的同时讲究权威性和秩序，“文化”应体现出超越阶级、宗派、个人小利益的力量，其化身应是能够传承人类优秀思想遗产、整合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之“权威”或“中心”。阿诺德的“文化”所提倡的，是一种“学习”文明（而非颐指气使的“教导”文明），它讲究慢功夫，讲究沉下心来学习、思考，而且强调全社会、全民性的启蒙益智教育。阿诺德所说的文化的“敌人”，恰恰是埋头苦干，只管低头拉车、不管抬头问路，只讲实践出真知的实干家。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阿诺德一直被视为英美知识思想传统、或曰其“主流文化”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有“保守”的一面，但他所坚持的理想具有文化守成的积极意义。还可以想一想，我们总是如此黑白分明地定义和区分“保守”与“进步”，乃至“保守”总带着贬义，成为抱残守缺、进步的绊脚石的同义词，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就是我们一向较多地引进、吸收了启蒙运动以来具有革命性能量的思想和著作，而对阿诺德这样的思想家却知之甚少。即使不谈我国的近现代史与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偏颇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就以我们处在日益向西方和全世界开放、经济实力飞速增长的时代而言，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的文化价值理想，耐心地听一听我们所不习惯的话，或许会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为了让不太熟悉阿诺德的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重要著作，下面将简单介绍阿诺德其人及其各类著述，当时的杂志

文化以及《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写作、出版过程，对译文所用的版本也作一交代。这部作品中阿诺德创造并反复使用了许多标语口号式的用语，本文将挑出一些“关键词”，列出英文原文，并简要地探讨中文处理问题。

1822年，马修·阿诺德出生在伦敦以西、泰晤士河流域的拉里翰村。他的父亲托马斯·阿诺德是著名的教育家，罗马史学者，1828 - 1841年任拉格比公学校长，1841年成为牛津大学现代历史钦定讲座教授，任期因他于次年去世而中断；他还是英国教会中被称为“广教会”或“宽和教会”一派的领袖人物，在神学中引入自由思想，主张宽容，因而在宗教争端中是纽曼的对立面。阿诺德博士在中学教育中进行了改革，开设数学、现代史和各门现代语言课程，设立体育、道德、宗教等科目，不仅开启心智，而且进行严格的体格、品格训育，使学生认真严肃地探索道德和社会问题，培养一种将传统的自由人文教育与现代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的意思。可以说，阿诺德在许多方面都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给家人的信件中常流露出继承父亲遗志的愿望和生恐辜负了父亲期许的惶遽。不过，求学时期的阿诺德却表现得像个纨绔子，喝酒、钓鱼、裸泳、恶作剧，不上教堂，也不用功读书，1844年在牛津大学毕业时只是个二等荣誉生；1845年却得到牛津奥里尔学院的住院士资格（他父亲在30年前曾被选为该学院院士），读经典、德国哲学、文学。阿诺德似乎并不感恩戴德，直到1847年成为兰兹唐勋爵的私人秘书之前，他表面上一如既往，逍遥自在；但这未始不是一种姿

态，在掩饰内心的矛盾和惶恐。1849年他发表第一部诗集《迷路的狂欢者》，令熟悉他的亲友对他刮目相看，原来他是那么的“认真”！但是那种直面人生、表露怀疑情绪的内容，也引发了不少尖锐的批评。

进入50年代后，阿诺德似乎安定下来了。由兰兹唐勋爵举荐，他获得教育调查委员会巡视员的职位，虽说对巡视小学并无真正的兴趣和热情，但他那时想结婚成家，迫切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俸禄，这一干就是35年。巡视员的工作十分辛苦，成年跑学校，检查排水、通风、设备、教师的表现、学生的成绩，还要同官僚制度打交道，写无数的报告。就以1855年的访问量来说，他巡查了290所学校，同368位实习教师、97位有证书的教师和2万名学生谈话。但这个工作也给了他出国考察的机会，他曾先后三次在欧洲访问，最长的一次达8个月，比较深入地了解了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国的教育制度。巡视员的经历使他对维多利亚社会的实际情况有了第一手的深入了解，国外的考察更加强了比较的眼光，这些无疑是他从事社会、政治批评的厚实的实践根基，也使他承担这份差事获得了新的意义：那不只是为经济的需要，还标志着他从“主观性”转向“客观性”的一种“哲学姿态”；如果说在诗歌中他探索了个人心理的话，他后来将更广泛地着眼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探讨形成心智之特质的诸多因素。

和同时代的许多名人一样，阿诺德有着公务生涯和写作生涯的双重人生。其文坛的成就分诗歌和散文两个方面，散文著作涉及文学、社会、政治、宗教、教育等几个相互

关联的领域，但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关注点；大致可以说，50年代是其诗歌时代，此后是“散文时代”：60年代是文学批评和社会、政治批评时代，70年代是宗教批评和教育批评时代，80年代又回到文学批评。其实，所有的批评都可以落实到广义的教育和转变人的内心这个问题上。

阿诺德的文名首先来自于他的诗歌，数量虽然不多，但成就得到公认，1857年被遴选为牛津大学诗歌讲座教授，又连任一届，直至1867年、也就是开始写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之时才卸任。阿诺德另一项公认的成就是文学批评。为1853年诗集作的一篇长序，表现出文学批评的才华：1865年发表了主要是文学批评类的作品集《批评一集》，阿诺德被誉为统领英国批评界那片荒芜之地的、最出色的批评家，后人认为阿诺德是英国文学学术批评的奠基人（收入该集的文学批评以评论法国作家为主，也有海涅和古典作家）。评论界对阿诺德如久旱逢雨似的大加赞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没有对手”：原先的文艺批评大家现在都在干别的事情，卡莱尔已年迈，早就不从事想像文字方面的批评；搞美术、建筑批评的罗斯金到60年代也转向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批评。但是，阿诺德很快也“转向”了，将“批评”的触角伸进维多利亚社会的方方面面，坚持了一二十年。反对者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阿诺德不应该越出自己最在行的诗歌创作或文学批评，浪费了自己的才华。以今天的话来说，文学应是他的“专业”，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方面他不是行家，只是“业余”，讲话难免幼稚可笑。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现任牛津大学教授的伊格尔顿所

说，在阿诺德的时代，传统的、胸怀宽广的文人（men of letters）正日益被做专门学问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所替代。他认为阿诺德代表“维多利亚最后一代文化伟人——既非学人亦非以文谋利者，而是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公众领域内部的声音。……与柯尔律治、卡莱尔和罗斯金等人一样，阿诺德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两大古典标志，而与学术知识分子形成对照：他拒绝被束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其实阿诺德在诗歌和文学批评中已明显流露出后来着重阐发的思想。和同时代的大诗人丁尼生、勃朗宁相比，阿诺德在观念和气质上更具现代性，他很早就深感社会和人心的涣散，缺乏凝聚力，诗歌的色调也更沉郁。《作于查尔特勒修道院的诗行》中有两行经常被引用的诗句：（诗人）“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死了，/另一个尚无力诞生”，道出了自己和同时代人的怀疑、骇惧和疲惫厌倦的心态，但也暗示出他日后为新世界的诞生将作不懈的努力。显著地预示阿诺德这一转向的是当时作为《批评一集》开篇的《当今批评的功用》一文。这篇文章本来是1864年10月在牛津大学的讲演，实际上阿诺德的不少名篇都源自牛津大学的演讲（如《论荷马史诗的译本》、《论凯尔特文学研究》等）以及教育巡视考察报告，应该说与他的“职业”密切相关。

《功用》篇将“批评”从人们共识中的“文学批评”范畴扩展到了广义的人生批评，指出在英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已占主导地位地位的“非利士人”（中产阶级）的思想行为缺陷。可以看

出，与同样激烈批评英国重利实用社会的卡莱尔、罗斯金有所不同的是，阿诺德更主张适当地脱离当时朝野所热衷的政治实践和具体行动，不要直接卷入争论，而要调整到一种虚怀若谷的心态，能进行不以党派宗派利害为转移的、客观公允的思考（disinterestedness），学习和传播“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提高思想、文化境界，了解人类发展中更加持常的根本性的东西，以开放的、自由活跃的思想检查人们当前的所作所为及其思想根子，或许会使国家少走弯路，发展得更合乎理想。其实这里已经提出了“文化”的原则。而当时的英国呢，人们充满改革热情，觉得问题太多，要只争朝夕地去解决；看到阿诺德不是雪中送炭，而似乎要搞阳春白雪，不免来气。另一方面英国人总是有一股狭隘的岛气，因工业化和改革的成就感到十分自满自傲，成天给自己唱赞歌，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最强，尤其对法国，无论从宗教还是政治道路来说都保持警惕；可阿诺德偏要数落伟大的改革力量的不是，说英国的不是，说外国人的好话（其实是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也是当时一般人难以接受的。虽说对《批评一集》总的反应不错，但阿诺德本人对负面批评也有充分的准备。他给亲人的信中说，“如果不是时不时地来点小爆发，让人们坐立不安，我就不可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事。”又说，“如果想引入一点新的思想方法的话，就可能而且必定会有点得罪人……但我越来越努力想得到的，不是我本人的成功，而是希望思想能高扬，这越来越成为我最深刻的信仰和我的本性的一部分。”

阿诺德主观上不想采取你来我回的论争姿态，只想以自

己的特有方式（包括讽刺、挖苦、嘲弄等刺激人们认识现状之不足与荒诞），不厌其烦地说理；但客观上他还是卷入了有关国家政治、政策、社会各阶层动向、宗教、国民性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论辩。《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在对论敌的回应中成书的，阿诺德也是借此机会对自己所坚持的思想又一次做了全面、系统的阐发。尽管这部重要著作已一版再版，但当初在报章杂志上论争的痕迹仍清晰可见。要理解这部书，也需要对当时特殊的报纸杂志文化有所了解。

1855年英国取消印花税后，印刷发行费用降低，加上识字的人大大增加，报业开始大发展，有了大发行量报纸（日报、下午报、晚报，后两种售量更大）；伦敦的“舰队街”集中了全国性报刊的报馆，报上的重头文章代表编者的意见，品评国内外重要事件。英国一向有言论自由的传统，所以各家报纸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有不同的政治、阶级倾向，各对应不同的读者层。阿诺德经常留意的大型日报有《泰晤士报》（1785年创刊，为现存英国历史最长的日报）、《每日电讯报》、《晨星报》、《不从国教者报》、《卫报》等，他本人常为《蓓尔美尔报》撰稿，如《友谊的花环》中假托的“通信”就发在该报上。各家报纸当然也有对阿诺德文章的反应，但总的来说，质量更好些的文章还是登在评论杂志上。严肃的杂志以政治时事评论和文学评论为主，也涉及宗教、哲学、科学等各类题目。阿诺德参与的或经常提到的有季刊《季度评论》（又译《评论季刊》）、《爱丁堡评论》、《威斯敏斯特评论》，月刊《考恩希尔》、《麦克米伦》、《双周评论》（1865

年创刊，第二年就改为月刊，开创署名评论风气）、《当代评论》，以及期刊界最活跃的周刊《星期六评论》、《雅典评论》、《旁观者》等。

阿诺德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引起报纸和杂志的关注和评论，根据反应再写文章，再评论，如此往复的过程最生动地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思想界的实际情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阿诺德的论敌们都参与了《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以下简称《文化》）的写作，他们的批驳帮助他将思想整理得更加完整、阐述得更加充分，而且如他所愿地帮助扩散了他的思想，使其为触动大众而选用的词语（“美好与光明”、“完美”、“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野蛮人”、“非利士人”等）不胫而走。阿诺德虽然严厉批评了英国的自由至上主义，但是能写出并发表这样的文章，本身也得益于英国论坛比较自由的、严肃的批评空气。期刊上对新书、文章的赞扬、好评当然是有的，但一般说来不大有吹捧的恶俗，相反对自己尊重的人也常有批评、评论（如阿诺德对卡莱尔等），看法可以很尖锐，不留情面，却是对事不对人。阿诺德的对立面尽管不接受他的见解，可仍尊敬他的人品、文才，有时还不打不相识，彼此生出一些好感，如他在《文化》中的主要批评对象弗雷德里克·哈里森。

《文化》的正文部分写作历经13个月，实际上从酝酿到最后出书的时间还更长。《当今批评的功用》于1864年11月在《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发表后，《星期六评论》有长文《马修·阿诺德先生与国人》评论《功用》，虽是匿名发表，但大家都知道作者是一直同阿诺德打“堑壕战”、信

奉功利主义的菲茨詹姆斯·斯蒂芬。阿诺德静观事态，收集反应，心里已准备回敬；因1865年大半年在欧洲大陆考察，无暇顾及，1866年2月方在《考恩希尔》杂志发表《我们英国人》（“My Countrymen”），正式转向政治批评。是年5月在牛津完成了《凯尔特文学》的最后一讲，因忙于写欧陆考察报告等，无法完成原定的诗歌讲座，一直到一年后，于1867年6月7日凌晨方完成在牛津告别演讲的讲稿，下午讲演，题为《文化与其敌人》，不久后按讲稿形式在《考恩希尔》发表，这就是《文化》成书后的第一章《美好与光明》。此后阿诺德听从《考恩希尔》主编史密斯的意见，仍静观事态发展，不忙于回应，待日报、周刊和杂志的反应集中起来再写。到12月初，阿诺德已写好《无政府状态与权威》（“Anarchy and Authority”），但意犹未尽，不断要求“再加一篇”，一直到1868年7月共写就5篇，这便是成书后的第2-6章以及“结论”。在写《权威》第5篇时，他已考虑将牛津讲座和这些文章、加上《我们英国人》等结集出版。

在出书前，阿诺德尚需为书作一序言，一方面对社会反应做进一步的回应，同时也为下面要写的《圣保罗与新教》做一过渡。1868年是阿诺德的伤心年，他的幼子巴西尔不到两岁就夭折，长子汤姆一直身体虚弱，就在阿诺德为《文化》开始写“序言”的时候病故，年仅17岁。但阿诺德仍完成了序言，并确定书名，1869年1月《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正式出版，不过章节号和各章标题是1875年出第二版时才加上去的，这些标题本身大都已成为名言。出第二版时还删去了一些指名道姓、过于涉及个人的文字。阿诺德生前

还出过第三版（1882），1883年由纽约的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美国版的《文化》与《友谊的花环》合订本。20世纪上半叶的版本中，比较著名的是多弗·威尔逊教授编的1932年剑桥版。

维多利亚时期的杂志文化为思想的阐发和交锋提供了舞台，促成了思想的活跃；阿诺德在陆续发文时引起了很多关注，或许因为人们已熟悉了他的意见和文风，所以《文化》首次作为书籍出版并没引起什么反应，反而是后来的《文学与教义》（1873）等宗教方面的文章曾成为最热销的著作。但《文化》却始终能引起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其高瞻远瞩的预见性和生命力，成为阿诺德著作中最为人们熟知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也被看作阿诺德思想的核心。

虽说《当今批评的功用》中“批评”的概念和《文化》中提出的“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在短短的几年中，英国国内外的形势又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美国内战结束，面临新的发展，原先英国支持南方的中上层也都倒戈；普鲁士在俾斯麦任首相期间实力大大上升，大有统一德意志的势头；法国在第二帝国期间调整了各方面政策，经济实力也大为加强，就以海上商船规模来说，总吨位直逼英国。英国虽然暂时还是强国，但国人的自满是其最大的盲点。从国内来看，辉格-自由党领袖帕默斯通去世（1865）打破了原先的平衡，引起新的政治动荡。1865-1868年党派斗争异常激烈，政府换了好几届，格拉德斯通实际上掌握了自由党，与布莱特联手，发动进一步扩大选举权的辩论（劳工阶级和中

产阶级的下层都还未获得选举权，所以在第二改革案的问题上，两个阶级是联手的）；国会吵得不亦乐乎，不大时兴大型政治集会的英国出现了示威游行，伦敦街头发生了骚动。虽说1832年的选举改革以来，“中产阶级”已成为英国的“中坚力量”，其上层对国家事务也有相当的发言权，可是在社会心理上，等级壁垒仍十分森严，阶级、阶层的区别不只是占有金钱和资源的不同，也体现在从事什么行业、上什么学校、去什么教堂、操什么样的口音、在什么店里买衣服（定制衣服）、如何待人接物等许多方面。或许可以说，英国社会在还没有充分的思想 and 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劳工阶级就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崛起了，打各种旗帜的人在争做其代言人，“民主”（在当时应指代表中下层大众的政治思想和政府形式）已提上日程。此外，爱尔兰问题也始终是隐患，“内部自治”和撤消爱尔兰圣公会国教地位的提案又引起新的分裂。这个阶段，阿诺德越来越感到英国处于转折关口，他在以前讨论法国问题时、现在在《文化》中、以后还会在《平等》等文章中，反复提出借鉴法国和德国，树立“国家”这个权威，由“国家”代表在历史上曾经由贵族提出的高尚理想及理念，凝聚国民的健全理智，扭转已在上升的无政府倾向。

这个时期，对于他人批评的回应和狭义的教育等都已纳入对英国在现代世界上的地位的考虑，1865年阿诺德在巴黎给家人的信中提到英国正在辩论的扩大选举权提案，明确说出了他最大的思虑。他希望上苍别让英国变成法国，但他接着又说，“然而愿上苍也别让英国停留在现在的状态。假如它停滞不前，就会在自己那一线上被美国打败，

而在欧洲一线上被大陆的国家打败。对此我就像看见眼前的纸一样看得一清二楚；但是看到了，又能做什么有益的事情，却是另一回事，尚需假以时日。” 此后所写的《我们英国人》、《友谊的花环》中的通信、《文化与其敌人》、《无政府状态与权威》各篇，都充满了这样的思虑。阿诺德绝对是主张变革的，他反复说要认清潮流，顺应大潮，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但他所希望看到的变革和进步却绝对不能脱离“过去”，脱离历史和文化的根基，绝不能轻言甩掉我们的历史、文化、情感、心理的包袱，这使他的作品有厚实的、特别沉甸甸的感觉。为了在秩序中实现变革，使英国、当然也是使人类平稳地走向更高的理想境界，就必须依靠广义的“文化”的力量。“文化”不是行动的敌人，而是盲目、短效行为的敌人；文化是前瞻性的，它致力于人自身的、内在的转变。

阿诺德严肃检讨英国的国民性、习惯、心理定式，找出英国最缺乏的东西，提出人类全面、和谐、整体地走向“完美”的目标和标准，提倡以“文化”、或曰广义的教育作为走向完美的途径和手段，学习、研究自古以来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文化、价值资源，从中补充、汲取自己所缺乏的养分。这些都不是当时务实的、性急的英国社会所熟悉和能够会心接受的东西，因此他被指责为不懂实际、超验主义、不着边际、高头讲章、玩弄精英主义、不关心不同情人民疾苦、长外国人的志气、灭英国人的威风，被人讥讽为“文化先知”，他的“权威”和“国家”论更是被说成专制主义。阿诺德清楚地知道他面对着什么样的力量，他想撼动的是什么样的痼习，